

苏珊·斯托克斯
言晓义 译

苏珊·斯托克斯 (Susan Stokes) 是芝加哥大学蒂芙尼和玛格丽特·布莱克杰出服务教授 (Tiffany and Margaret Blake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并担任芝加哥民主研究中心 (Chicago Center on Democracy) 主任。她最新的著作是《倒退者：为什么领导人会破坏他们自己的民主》 (The Backsliders: Why Leaders Undermine Their Own Democracies) (2025)

译者言晓义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

中国民主季刊

第4卷 第3期
2026年7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为什么民选 领导人颠覆 民主

编按：过去20多年表明，当代民主面临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军事政变，而是由民选官员主导的民主侵蚀。苏珊·斯托克斯（Susan Stokes）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民选领导人得以侵蚀民主的原因以及可以采取什么行动阻止、逆转这一趋势。她的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政党体系重组，尤其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以及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左翼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她认为，要抵制民主衰退，需要反对派政治精英、公民社会组织、司法机构以及选民之间的协调行动与共同努力。本文2026年4月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7, Number 2, April 2026, pp. 49-64）。

军事政变不再是世界上民主不稳定的主要来源。进入21世纪后，由民选领导人推动的民主侵蚀已构成对民主的首要挑战。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有20多个国家的总统和总理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上台执政，随后却开始着手破坏他们国家的公共机构。这些领导人威胁和审查新闻媒体，安插效忠于自己的法官，解雇专业的公务员，将独立机构武器化，使其沦为行政权力的工具，骚扰非营利组织，并将自身的权威强加于大学。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者们对所谓的民主侵蚀（democratic erosion）或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进行了深度描述，并指出了促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因素。¹

但他们尚未充分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在当前的历史

时刻出现民主侵蚀激增？又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大风险？还有另外两个同样关键的问题值得一提：为什么选民会容忍那些攻击公共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遏制这一进程？²

民主倒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在当今的发达民主国家中，这些数十年前开始的变化为新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政党（ethnonationalist）创造了机会；这些政党在许多国家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选民。在一些国家，这些政党加入了执政联盟，其领导人成为总统或总理。而一旦掌权，其中一些人就颠覆本国的民主制度。

另一种导致民主倒退的意识形态类型，是左翼民粹主义者（left-populist）。我们已经看到，这类人物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中获得了权力。左翼民粹主义者的攻击目标并非族裔上的“他者”，而是富人。但与富裕民主国家中相对应的右翼一样，左翼民粹主义倒退型领导人同样试图拆毁那些限制行政权力扩张的既有制度。

要解释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必要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政党竞争主要围绕中左翼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右翼保守主义政党展开——例如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以及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左翼政党与工业工人阶级以及工会组织有着紧密联系，而右翼政党则同高收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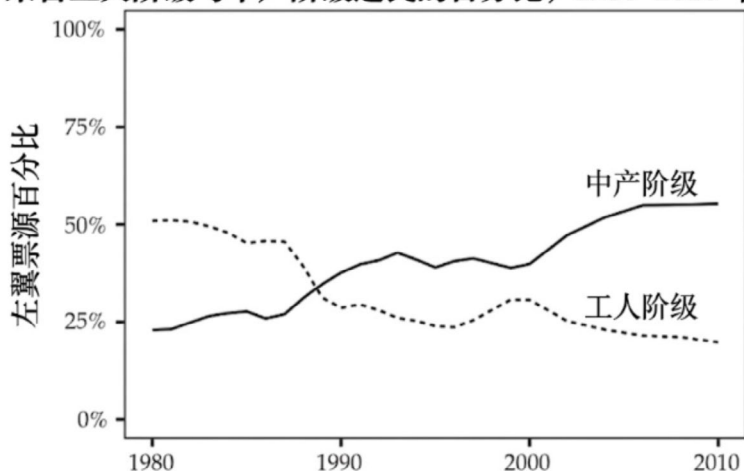
民和商界保持联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工人数量的缩减以及劳工运动的衰落，促使左翼政党开始将自身的吸引力扩展到工人阶级之外。它们将注意力转向受过大学教育、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选民；并非巧合的是，也正是这些专业人士后来填补了议会席位，并占据了其他政党领导岗位。³

尽管中左翼政党在社会福利支出与社会保障方面，依然比其保守主义竞争对手投入更多，但它“亲工人阶级”的形象却开始变得模糊。在20世纪90年代，中左翼政党与保守派在支持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上逐渐趋同——即减少跨国贸易、资本与人员流动的壁垒。美国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英国的“新工党”（New Labour），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路线，都拥抱了经济全球化。

这种转变重塑了中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正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到1990年时，欧洲左翼政党的支持者中，中产阶级选民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工人阶级或低收入选民。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政党则保留了其历史性的政策承诺；实际上，在一些显著案例中，它们甚至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国家、反监管立场，这一点可以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得到体现：“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字是：‘我是政府派来的，我是来帮忙的。’”⁴

图 1——欧洲左翼政党支持中
来自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选民的百分比，1980–2010 年



来源：杰恩·金里奇和西尔雅·豪瑟曼，《工人阶级选票的减少、福利支持联盟的重组及其对福利国家的影响》（Jane Gingrich and Silja Häusermann, “The Decline of the Working-Class Vot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Welfare Support Coalit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 Welfare Stat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5, no.1, 2015: 5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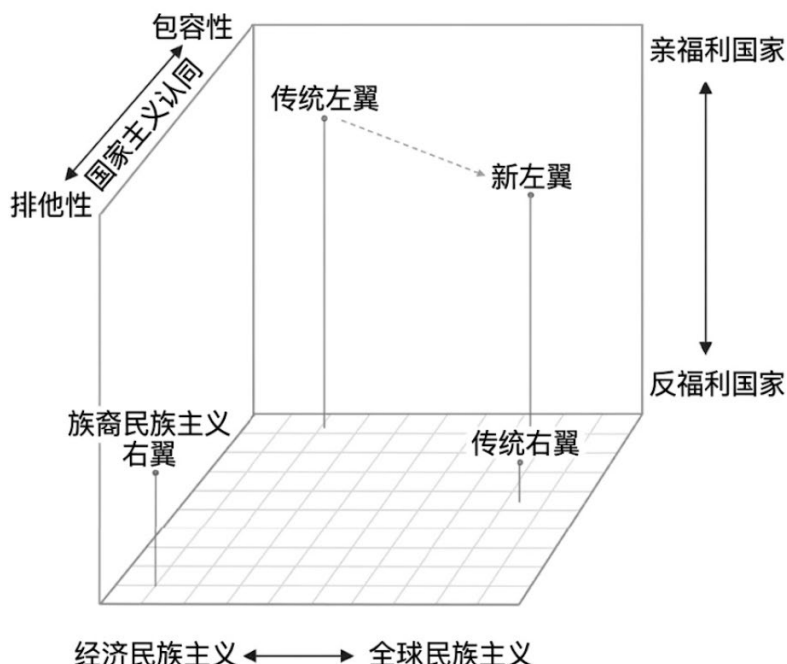
注：该图表报告的是两年滚动平均值。

这些经济发展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使发达民主国家中的大量低收入选民在既有政党体系中相对失去了依托。因此，一批政治创业者（political entrepreneurs）得以获得发展空间，他们开始为全球化引起的不满发声。新的政党开始表达选民那种“被抛在后面”的感受——在这样的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不断飙升，而其他

群体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党内派系崛起的背景。他们的领导人对经济充满牢骚，在许多情况下，还比传统右翼更支持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⁵与此同时，在这些高度不平等且对全球开放的经济体中，右翼民族主义者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确立了一种鲜明立场——一种排他性的、反多元主义的立场。

图2从三个维度展示了这些转变：政党在福利国家规模、经济开放度以及国家认同上的立场。20世纪后期传统政党立场的变化，促使右翼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更支持社会福利、更具经济民族主义色彩以及更排他的政治立场。

图 2——发达民主国家政党立场的三个维度



而传统左翼政党与新左翼政党依然较为多元主义，并更能接受不同身份认同；右翼民族主义者则会界定出一个“他者”，并将其妖魔化、塑造成国家的威胁。这个“他者”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它可能是非基督徒或非印度教徒、穆斯林或犹太人、非洲裔群体、库尔德人（Kurds），或 LGBTQ+ 群体；甚至也可能是那些被认为不够虔诚的本国公民（如土耳其），或者被领导人贴上“共产党人”标签的人（如巴西与菲律宾），又或者被描绘成“低等罪犯”的（如萨尔瓦多人）；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他者”还包括移民。

并非所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都能够赢得选举。即使他们获胜，也并非总是瓦解本国的民主制度。但他们要突破既有政党体系，还蔑视所谓“精英主义”制度，这种倾向使得他们更可能图谋破坏民主。⁶至于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则把富人以及国际资本视为敌人。在执政期间，许多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会推出旨在减少不平等、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采用倒退型领导人的玩法：改写宪法以扩大行政权力、骚扰新闻媒体、削弱司法独立，以及弱化选举作为问责机制的功能。

并非所有拉美左翼领导人都是民粹主义的制度破坏者。在智利和巴西，一连多位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总统在不破坏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了改善贫困人口生活与发展前景的政策。但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的左翼民粹主义者则修改了宪法，扩大了行政权力，并削弱了法院与立法机构。在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Manuel López Obrador，2018—2024年在任）提高了最低工资、增加了养老金，同时也削弱了独立司法体系，还使国家选举机构更容易受到政

党影响。而委内瑞拉与尼加拉瓜的左翼领导人则主导了对基本民主支柱的破坏，包括剥夺反对派组织与参与公平选举竞争的权利。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完全走上了威权主义。

经济不平等与民主的倒退

尽管导致民主倒退的领导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异质性，但让他们得以上台的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特征：这些国家往往存在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我与伊莱·劳欧（Eli Rau）做的跨国统计分析表明，不平等是增加民主侵蚀风险最强大、最有力的结构性特征。⁷与人均收入、国家治理能力或民主制度的存续年限相比，不平等对于风险程度差异的解释力更强、也更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人均收入衡量）在民主倒退中的作用较小，而且这一作用的测量结果也不那么一致。至于国家治理能力以及民主制度的不间断存续时间，它们的作用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更容易面临民主侵蚀，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民主倒退在21世纪初开始加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侵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加剧了那些将在21世纪推动民主倒退的种种紧张关系（tensions）。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言，全球化可预见地扩大了贫富差距与社会紧张。⁸在富裕国家中，全球化加速了制造业外流，加之移民劳动力涌入，结果加深了“身份裂痕”，还促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也就是我所说的右翼族裔民族主义），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成了攻击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带来了外国产品与外国投资的大量流入，

用罗德里克的话说，这加剧了“收入裂痕”，还助长了左翼民粹主义以及对富豪和大型企业的攻击。

在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更容易被社会所吸收。在社会冲突较为缓和的地方，民主倒退的趋势也同样缓和。事实上，那些相对平等的国家，例如北欧民主国家，其民主风险较低。⁹ 瑞典便是这种相互作用（dynamics）的一个典型例证。在2010年代，瑞典出现了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Sweden Democrats），其主要政治主张是反移民。但尽管该党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并对政策产生影响，瑞典的民主制度却没有显示出任何遭到侵蚀的迹象。在瑞典，没有政治人物质疑选举的公正性，也没有人试图控制媒体或削弱司法独立。¹⁰

军事政变过去作为民主主要威胁时期所建立的民主崩溃统计模型，未能预测到美国已经持续了15年的民主衰退。¹¹ 按照旧模型的观点，像美国这样富裕而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¹² 但如果我们研究的不是政变，而是民主倒退的成因，那么美国在21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概率就会显著上升。¹³ 政变与民主倒退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dynamics），并由不同的行为者实施。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充分理由将二者视为不同的结果，并将其作为不同的因变量来处理。

要研究与民主侵蚀相关的因素，我们需要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能够将其与行政长官较为传统的秀肌肉行为（muscle-flexing）区分开来的方法。政治学家梅利斯·莱本斯（Melis Laebens）开创了这样一

种有用的研究办法。它借鉴了强调“问责制”是民主核心的民主理论¹⁴——包括“横向问责”，即总统与总理受到法院、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以及监督组织制约；也包括“纵向问责”，即领导人受到选民制约（以及受到媒体制约，因为媒体向公众披露政府行为）。当一国的专家认为横向问责与纵向问责都在短时间内出现显著下降时，莱本斯便将该国编码为发生了民主侵蚀。

劳欧与我遵循了莱本斯的研究办法，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与总理进行了编码，主要根据他们是否、以及何时开始侵蚀本国民主制度。然后，我们将民主侵蚀发生的年份与年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指标（例如基尼系数，Gini index）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人均收入与民主制度的持续时间）进行匹配分析。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收入不平等最终显现为民主侵蚀中一个强劲和显著的因素。

我的著作《倒退者》（*The Backsliders*, 2025）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之间的联系。其中若干联系是相对直接的。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人口中相当大的部分往往感到不满，因为社会变得更加富裕的过程中，他们被甩在了后面。即使并不清楚自己在同侪中的具体排名，低收入者在高度不平等的体系中也常常会遭受实际损害。当住房等关键市场迎合富裕群体时，生活成本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便会变得难以承受。因此，不平等以及它所催生的被剥夺感，会促使贫困群体拥抱非自由派政党（illiberal parties）。这些政党鼓励一种观念：精英制度、非本国公民以及那些在文化上与他们不同的群体，正是导致相对贫困者被边缘化的原因。收入高度不平等对民主的威胁性影响也波及富人。60多年前，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便曾推测，在收入高度两极化的社会中，富人倾向于把赤贫

者视为“低等人”，部分原因在于：面对他人的匮乏，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心理机制来为自己的财富辩护。¹⁵

不平等还会削弱人们对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信心。一项2022年的研究记录了美国人在过去50年间对各类机构信任度下降。这些机构包括国会、总统以及（较近期的）最高法院，也包括银行与华尔街、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宗教机构。¹⁶ 该项研究的作者指出，美国多个制度层面出现的这种信任侵蚀，与“50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相对应。¹⁷

除了不满与不信任之外，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还容易出现党派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¹⁸ 部分原因在于：当群体利益差异如此巨大时，谁掌握权力便显得格外重要。潜在的独裁者会从政治极化中获益，这会激励这类领导人进一步加剧极化。一个高度极化的选民群体，即便总体上支持民主制度，也会对总统或总理攻击公共制度的行为表现出更高的容忍度。¹⁹ 一个人或许会这样想：我未必喜欢他攻击新闻媒体或法院，但上帝保佑，绝不能让对立阵营掌权。

在《民主侵蚀始于顶层》（*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2023）一书中，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指出，欧洲国家出现民主侵蚀并不是因为公众舆论转向反对民主；相反，反民主的心态其实是精英政治话语的产物。²⁰ 类似地，我也研究了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20年间所有民主国家中的极化水平，并以专家调查的数据作为衡量依据。在这里，研究结果再次表明，推动党派对立加剧的主要力量是政治领导人，尤其是那些破坏本国民主制度的领导人。

1995年时，那些后来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与那些不会发生民主侵蚀的国家，在“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平均水平上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但到了2020年，发生民主倒退的国家已经表现出显著更高层次的党派极化。²¹因此，不平等为野心勃勃且渴望扩大自身权力的行政首脑创造了机会——他们可能利用选民在经济上“被甩在后面”的感受，以及他们对制度失去信心的情绪，还经常把民众的困境归咎于移民或少数群体，声称这些人“偷走”了工作机会以及垄断了福利资源。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党派极化会助长民主倒退。²²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民主倒退者们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中更容易壮大，因此他们会努力进一步加深极化，并向政治竞争对手发出充满仇恨的指控。例如，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在任）经常将其工人党（Workers’ Party）对手称为“共产党人”，并且曾经哀叹道：

“选举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遗憾的是，只有等到这里爆发内战的时候，一切才会改变；而且我们还必须完成军政府当年没有完成的事情：杀掉3万人。如果有一些无辜的人死去，也没关系。任何战争中都会有无辜者死亡。哪怕我自己死了，只要能有3万人陪葬，也就足矣。”²³

极化与“说民主坏话”

然而，极化策略并非毫无风险。当一位总统把主要反对党及其支持者称作“怪物”时，他的支持者或许会真的相信这些说辞，并因此更加

蔑视对立阵营；但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会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被贴上“怪物”标签的人？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人同样会被总统的言辞所动员——也就是说，被动员起来反对他。原本可能不会投票的反对派支持者，现在却拥有了强烈动机前往投票站，投票反对总统及其所属政党。甚至一些倾向反对派的独立选民，也可能因此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位正在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

为了规避这种因极化言论和行动而引发反弹的风险，潜在的独裁者还拥有另一种工具。他们可以试图说服选民，让他们相信本国的机构早已空洞、腐败而无能，因此，即便领导人削弱这些机构，也不会损失什么。我将这种策略称为“说民主坏话”（trash-talking democracy），意思并不是贬低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本身，而是贬低那些民主倒退者所瞄准的具体机构。回想一下，极化言论实际上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真正的威胁是对立阵营的胜出。”而“说民主坏话”则是在说：“别担心我对机构的攻击——这些机构腐败无能，不值得捍卫；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些机构拆掉再重建，情况反倒好了。”而所谓“重建”，最终将使这些机构更加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

文本定量分析技术取得的进步，使研究政治人物话语成为可能。借助这些技术，研究者不仅能够在大规模文本中识别不同类型的话语模式，而且更关键的是，还能够辨别这些言论的语气——例如，区分一位总统针对新闻媒体或选举机构所发表的是贬低性言论还是赞扬性言论。一项2025年的研究运用了这些技术，结果发现，在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担任总统期间，他花费在“说机构坏话”上的时间，比批评反对党所花的时间还要更多。²⁴ 在《倒退者》一

书中，我将这一分析扩展到委内瑞拉那位摧毁民主的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1999—2013年在任）。与性格严肃阴郁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不同，查韦斯是一个“快活的斗士”；但当他的言论转向阴暗时，其攻击目标往往主要是各种机构，而不是反对派领导人或政党。

当领导人贬低本国机构时，他们的话语会影响公民的看法吗？我在拉丁美洲、土耳其以及美国获得的证据表明，“说坏话”确实会削弱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并且，正如我预测的那样，它在产生这种效果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反对派选民强烈反弹。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坏话”并不只是“单纯”的修辞。举例而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每个工作日都会举行长达数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这种庞大的演讲工程，为他后来攻击墨西哥国家机构预先塑造了公众舆论。当墨西哥最高法院阻止总统对国家选举事务院（National Electoral Institute，简称 INE）进行的政治化努力时——该机构负责监督全国选举——他便将自己的语言攻击炮火转向法院，反复指责相关裁决是由“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作出的。

最终，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与现任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Claudia Sheinbaum）改变了整个联邦司法体系的遴选方式：从2025年起，所有联邦法官都通过普选产生，其中包括墨西哥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同年6月举行的首次司法选举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候选人名单，竞争881个联邦法官职位；在一些州，地方层级法官也同时进行选举。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可能是导致投票率极低（13%）的重要原因之一。执政党还分发了标示本党关联候选人的“作弊小抄”，而

这些候选人最终赢得了绝大多数法官席位。这一经历引发了人们对司法机构服从行政部门的广泛担忧。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倒退型领导人？

倒退型领导人“说民主坏话”时常包含某些真实成分。但这些领导人试图极化社会、摧毁公众对制度信心的目标，也会驱使他们编造纯属幻想的叙事，即许多支持者都会相信的阴谋论。例如，2018年，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曾警告印度选民说，如果国大党（Congress Party）执政，大部分社会福利支出就会被转移给穆斯林。²⁵ 2020年在美国，一位总统顾问声称：“我们的选票是在德国和西班牙统计的，而负责统计的公司归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关联方所有。”²⁶ 而在2024年，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则宣称真正赢得大选的是他自己，尽管实际上反对派候选人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人们之所以会相信政治人物这些荒诞不经的说法，原因多种多样，其中许多属于心理或情感层面。许多政治人物都是高明的“业余心理分析师”，他们凭直觉便知道如何激发人们的负面情绪。根据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如果把一种糟糕的处境描述为某些人有意实施、旨在伤害特定个人或类似群体的行为所致，那便会激起人们的义愤。²⁷ 而这些情绪属于“趋近型情绪”（approach emotions）——即一种可以驱使人们走向公共空间、与他人接触并采取行动的情绪——因此对政治人物极具利用价值。最后，老练的政治人物还会与支持者建立情感纽带。人们可能会钦佩、甚至热爱自己的领导人，因此也更容易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困在宣传和阴谋论的世界中无法脱身。批判性思维和教育能够让人对极端误导性的说法产生免疫力。

怎么办？

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而民主倒退这场戏仍在继续展开。因此，我们对迄今为止从这些经历中能吸取的教训应当保持谨慎——无论是关于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掌权时减缓侵蚀、如何通过亲民主力量在任期内替换这些领导人，还是如何在倒退型领导人下台后修复民主侵蚀所造成的损害。

在考虑各种应对方案时，我们应当牢记民主倒退国家的模糊性质：它们虽然部分走向了威权主义，但仍然保留着部分民主特征。只要那些原本用于制衡行政权力的制度仍有一部分保持有效，亲民主力量就能够利用这些制度来阻挡民主的倒退者。在国家立法机构中，亲民主的少数派政党即便无法完全阻止政府削弱或摧毁制度，也至少能够拖慢这一进程。州与地方政府中的少数派领导人，也能够自身辖区内采取行动，以阻挡威权主义指令。法院仍然可能作出不利于政府的裁决，从而重新确认法治原则，并保护其他机构不受行政权力侵蚀。即便在司法独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的体制中，法院仍有可能作出反对行政部门的判决，并帮助保护亲民主政治人物与活动人士，使他们免受行政权力的打压。与此同时，公民社会仍可以发动抗议、向公众传播信息，并对行政部门提起法律行动；媒体机构也仍能够继续报道政府的不当行为。

民主倒退的国家仍然会举行选举，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领导人尽管

拥有在任所带来的优势，最终仍被选民赶下台（例如2021年的赞比亚、2022年的巴西以及2023年的波兰）。还有一些人则碍于任期限制而离任（例如2017年的厄瓜多尔与2024年的墨西哥）。另一些则被其所属政党所罢免（例如2018年的南非）。更少的情况是，一些推动民主倒退的总统被民众起义推翻（例如2014年的乌克兰）。因此，选民——无论是通过选举直接发挥作用，还是通过向政党施压而间接发挥作用——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潜在的独裁者希望自己看起来锐不可当，但事实上，他们存在一些可预测的弱点。他们的政治计划是要打破限制自身的制度结构，并颠覆“照常运作的政治”。因此，这类领导人往往会让忠诚度高于能力的人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例如，在描述博索纳罗时，一组巴西政治学家团队指出，他“亲手挑选了那些从未担任政治职务或未曾当选过公职、完全没有公共行政或政策经验的人”，从而造就了“一个由右翼极端主义业余人士组成的政府”。²⁸ 缺乏从政经验的效忠者不太可能阻止总统的昏庸决策。但亲民主人士与团体——包括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不能坐等倒退的领导人犯错。

精英政治战略家（elite political strategists）：这一群体包括亲民主政党的领导人、竞选战略家与传播专家，以及相关政策专家。无论是在全球南方国家还是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都会增加民主制度破裂的可能性。亲民主政党与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与低收入和工人阶级选民建立联系，并采纳有利于贫困者与劳动者的政策立场，以回应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许多在当今经济模式下逐渐脱离普通人承受范围的基本需求。此外，那些希望重新赢回“被甩在后面”的选民的政党，也必须改变它们自身的组成

与形象，不应只把律师、医生与企业领袖送入议会，也应让工会成员、餐厅服务员以及教师进入其中。

在民主倒退由左翼民粹主义者主导的地方，亲民主力量则必须让选民相信，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与更公平的机会，同样能够在民主制度中实现。民主与社会正义、包容性经济之间，并不存在彼长此消的必然取舍关系。事实上，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人民也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几乎从定义上说——他们的基本权利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受国家权力任意搜查、拘押与法外伤害的权利。²⁹

除了政策与战略层面的行动之外，亲民主的政治精英还可以怎样对抗或减缓民主倒退？一种选择是利用现有的制度渠道。例如，在 21 世纪初的哥伦比亚，反对派立法者利用议会程序阻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Álvaro Uribe）政府提出的反民主改革。尽管这些反民主改革措施最终仍获得通过，但反对派还是成功拖慢了总统推动民主倒退的议程。反对派的这种“刹车”行动，为法院与公民社会组织作出反应争取了时间。³⁰ 由反对派控制的地方政府，也能够对国家层面的民主倒退起到制衡作用，例如巴西博索纳罗政府时期，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两届任内所发生的情况。

一旦亲民主力量自己掌权，它们就会面临一种策略上的困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模仿此前民主倒退者所采取的破坏规范与规则的行为。例如，如果潜在独裁者曾改变高等法院的组成，那么亲民主领导人在获得机会后，是否也应该这样做？即使严格来说并未违反规则，亲民主力量是否应该积极行动、重新夺回失去的权

力，以便追究民主倒退者的责任？

在这场争论中，“反对”的一方认为：如果每一方都利用自己执政时期不断升级冲突、进一步贬损制度，那么遵守规范的行为将永远无法重新确立。此外，如果民主倒退者之所以得势，是因为民众认为制度腐败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党派性，那么激进策略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看法。

而“支持”的一方则认为：如果不采取激进策略，民主本身可能会彻底丧失。法院可能会不可逆转地落入行政部门或执政党的掌控；选举制度也可能遭到破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再准确反映选民意愿。按照这种观点，亲民主力量不应放弃制度性的“硬球”（harball，这里指“强硬手段”），也不应单方面“解除武装”；相反，他们必须以毒攻毒。³¹

对于这一困境，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错误的答案。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伴随着必须谨慎权衡的代价。如果民主本身即将丧失，那么拒绝采取强硬策略几乎毫无意义。但如果民主并未真正面临生死存亡，那么使用强硬手段则可能适得其反，反而印证民主倒退者的说法：所谓“精英”制度与过时规则，不过是帮助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工具。

公民社会：这一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专业协会、私营企业、媒体机构以及大学等。尽管这些组织名义上属于“非政治性实体”，但由于它们可能阻碍潜在独裁者的目标，因此始终处于这类领导人的视线之中。例如，独立媒体会报道官方腐败、违法行为与无能表现；公民社会组织同样会监督政府行为，并组织示威活动；大学学者则会教导

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开展有时会反驳政府叙事的研究与分析。

因此，民主倒退的政府经常会采取严厉措施压制那些被视为威胁的群体：剥夺媒体机构的资源——从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政府官员的渠道——甚至以暴力对付记者；宣布公民社会组织非法并加以关闭；让政府内部人士控制大学领导层，削减大学预算，限制或拒绝学者获得研究资金。然而，即便面临这一系列惩罚，公民社会仍会进行抵抗。民主侵蚀从来不会在毫无挑战的情况下发生；它总会在公民社会中激起愤怒。记者会敦促媒体所有者抵制审查制度；教授与学生会要求大学管理层捍卫学术自由；公民社会会组织并教育民众，为民主挺身而出；律师则会谴责那些为了反民主议程而违反职业伦理的政府同行。

抵抗一个不断扩张权力的行政部门所施加的反民主干预，代价可能极其高昂；由于政府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与资源，风险极大。媒体机构可能失去资源——从新闻报纸、广播许可证，到接触其必须监督报道的政府官员渠道。记者有时还会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公民社会组织可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并遭关闭；大学领导层可能被政府内部人士接管，其预算与研究资金渠道也会被削减。但即便代价如此高昂，公民社会中的一些群体仍然会坚持抵抗。记者坚持准确报道事实；律师拒绝代表政府从事“法律战”（lawfare）；活动人士则设法继续组织行动。这种来自公民的压力，有时会迫使倒退者放慢脚步，甚至改变方向。

当民主遭到攻击时，法治总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因此，律师、法官以及律师协会往往会被卷入这场斗争——有时充当政府的“步兵”，

但更多时候则发挥关键作用减缓甚至阻止本国民主侵蚀。即便在民主已经严重退化的国家中，法院仍可能减缓权力扩张型行政领导人的掠夺行为。以土耳其为例。如今，它通常被视为“选举式威权政体”甚至完全威权政体。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严重削弱了司法部门的独立性。总统曾借助法院之力监禁反对派政治领袖与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在一批学者签署公开信、呼吁和平解决库尔德冲突之后，埃尔多安发起了一场旨在将大学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行动。然而，土耳其法院拒绝赋予总统任命大学校长与解雇教授的权力，至少为学术界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³²

最后，一些专业协会——例如新闻俱乐部与律师协会——有时也会对违反职业伦理与专业规范帮行政部门攫取权力的成员进行纪律处分。这种措施能够有效激励专业人士避免从事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不过，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下，就连律师协会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攻击的对象。例如，在2025年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便因两名记者死亡事件争议，下令撤换整个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理事会。³³

选民与抗议者：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倒退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支持率会下降？当公民认为这些领导人过于腐败或过于自利，并且意识到失去法治、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代价过于高昂时，他们就可能转而反对民主倒退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选民会开始把票投给反对派，并参加各种规模的示威活动，以表达对潜在独裁者的不满，从而鼓励政治精英更大胆地捍卫民主。

即使对许多选民而言，民主权利与制度的价值较为抽象，他们仍可

能因为一些常规原因而转而反对倒退的民主领导人，例如经济低迷、工资停滞与高通胀。这种政治行为被称为“回顾性经济投票”

(retrospective economic voting)，它既可能击败倒退型领导人，也可能击败坚定的民主派。但同样，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存在一些可预测的弱点，而这些弱点会导致他们犯错，从而削弱公众支持。

2022年，当巴西选民否决博索纳罗时，他发动了一系列有时带有暴力性质的行动，试图继续掌权。然而，国家的制度最终还是幸存了下来。巴西军方并未支持博索纳罗推翻败选结果的企图，而这位70岁的失势前总统后来还因策划政变未遂而被定罪。如今，他正在服刑27年。这样的结果，标志着民主的复兴。

民主倒退并非不可阻挡。精英、公民社会以及普通公民都拥有某些反制手段。反对派立法者、媒体、教授、律师与法官、选民与抗议者——所有这些人人都能够减缓或阻止国家滑向威权主义。要找到正确策略，并在民主权利空间不断收缩之际仍鼓起勇气挺身而出，确实并不容易。但我们必须行使这些权利——因为它们就像肌肉一样，如果长期不用，便终将萎缩。

注释

1 南希·贝尔梅奥，《论民主倒退》(Nancy Bermeo, "On Democratic Backsliding," *Journal of Democracy* 27, January 2016: 5–19)；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齐布拉特，《民主如何死亡》(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Books, 2018)；斯特凡·哈格德和罗伯特·考夫曼，《倒退：当代世界的民主退步》(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Backsliding: Democratic Regres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 我最近的著作对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参见《倒退者：为什么领导人会破坏他们自己的民主》（*The Backsliders: Why Leaders Undermine Their Own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5）。
- 3 尼古拉斯·卡恩斯和诺姆·卢普，〈白人工人阶级与 2016 年选举〉（Nicholas Carnes and Noam Lupu,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the 2016 Elect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9, no. 1, 2021: 55–72）。
- 4 罗纳德里根，〈总统新闻发布会〉（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86）。
- 5 拉塞尔·J·道尔顿和卡尔·C·伯宁，〈欧洲的意识形态极化与极右政党〉（Russell J. Dalton and Carl C. Berning,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d Far-Right Parties in Europe,” in *Rechtspopulismus in Deutschland*, ed. Heinz Ulrich Brinkmann and Karl-Heinz Reuband, Wiesbaden: Springer, 2022, 13–35）。
- 6 专家认为，在米莱（Milei）（2023 至今）和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Fernández de Kirchner）（2007–2015）政府时期，阿根廷曾接近民主侵蚀的边缘，但并未达到该状态。参见斯科特·梅因沃林和路易斯·斯基乌梅里尼，〈拉丁美洲公民自由保护与公民的民主承诺〉（Scott Mainwaring and Luis Schiumerini,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and Citizens’ Democratic Commitment in Latin Ameri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25）。
- 7 伊莱·G·劳欧和苏珊·斯托克斯，〈21 世纪的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Eli G. Rau and Susan Stok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2, no. 1, 2025: e2422543121）。
- 8 达尼·罗德里克，〈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学〉（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 nos. 1–2, 2018: 12–33）。
- 9 劳欧和斯托克斯，〈收入不平等与民主侵蚀〉（Rau and Stok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Erosion of Democracy”）。
- 10 博·罗斯坦，〈瑞典右翼的阴影〉（Bo Rothstein, “The Shadow of the Swedish Right,”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anuary 2023: 36–49）。
- 11 萨拉·雷普奇，〈扭转美国民主的衰退〉（Sarah Repucci, “Reversing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2: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Authoritarian Rule*,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23,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22/global-expansion-authoritarian-rule/reversing-decline-democracy-united-states>）。
- 12 亚当·普热沃斯基，〈民主的危机〉（Adam Przeworski, *Cris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丹尼尔·特雷

- 斯曼,《当前对民主的危险有多大? 基于历史数据的风险评估》(Daniel Treisman, “How Great Is the Current Danger to Democracy? Assessing the Risk with Historical Dat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6, no. 12, 2023: 1924-52)。
- 13 普热沃尔斯基和特雷斯曼的估计接近零; 劳和斯托克斯的估计显示, 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发生民主侵蚀的年度概率约为 9%。
- 14 梅利斯·G·拉埃本斯,《超越民主倒退: 现任领导人的篡权企图, 1989–2019》(Melis G. Laebens, “Beyon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cumbent Takeover Attempts, 1989–2019,” working pap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22)。
- 15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民主的若干社会前提: 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no. 1, 1959: 69–105)。
- 16 亨利·E·布雷迪和托马斯·B·肯特,《50 年来美国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与极化的加剧》(Henry E. Brady and Thomas B. Kent, “Fifty Years of Declining Confidence and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in Trust in American Institutions,” *Daedalus* 151, no. 4, 2022: 43–66)。
- 17 见上, 布雷迪和肯特,《50 年来美国机构信任度的下降与极化的加剧》, 57 页。
- 18 约翰·沃海斯、诺兰·麦卡蒂和鲍里斯·肖尔,《不平等的收入、意识形态与政治僵局: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如何加剧政治极化》(John Voorheis, Nolan McCarty, and Boris Shor, “Unequal Incomes, Ideology and Gridlock: How Rising Inequality Increas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 <https://dx.doi.org/10.2139/ssrn.2649215>)。
- 19 米兰·W·斯沃利克,《极化与民主》(Milan W. Svobik, “Polarization versu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0, July 2019: 20–32)。
- 20 拉里·巴特尔斯,《民主侵蚀始于顶层: 欧洲的领导人、公民与民粹主义挑战》(Larry Bartels, *Democracy Erodes from the Top: Leaders, Citizen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pulism i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 21 斯托克斯,《倒退者》, 129 页。
- 22 例如, 参见斯沃利克,《极化与民主》; 马修·H·格雷厄姆和米兰·W·斯沃利克,《美国的民主? 党派性、极化与对民主支持的稳健性》(Matthew H. Graham and Milan W. Svobik, “Democracy in America? Partisanship, Polarization, and the Robustness of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 no. 2, 2020: 392–409); 穆拉特·索默、詹妮弗·L·麦科伊和罗素·E·卢克,《有

- 害极化、威权化与反对派策略》(Murat Somer, Jennifer L. McCoy, and Russell E. Luke, “Pernicious Polarization, Autocratization and Opposition Strategies,” *Democratization* 28, no. 5, 2021: 929–48)。
- 23 博索纳罗 2018 年 1 月 10 日的演讲, 引自玛丽安娜·西蒙斯, 《巴西极化新总统贾伊尔·博索纳罗的自述》(Mariana Simões, “Brazil’s Polarizing New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in His Own Words,”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2018)。
- 24 劳塔罗·塞利亚、伊佩克·奇纳尔、苏珊·斯托克斯和安德烈斯·乌里韦, 《通过说民主坏话建立对倒退的容忍: 来自墨西哥的理论证据》(Lautaro Cella, Ipek Çinar, Susan Stokes, and Andres Uribe, “Building Tolerance for Backsliding by Trash-Talking Democracy: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Mexico,”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irst View, 2025, <https://doi.org/10.1177/00104140251328024>)。
- 25 莫迪在 2024 年全国选举竞选中发表了这些言论; 参见人权观察, 《印度: 仇恨言论助长了莫迪的选举竞选》(Human Rights Watch, “India: Hate Speech Fueled Modi’s Election Campaign,” 14 August 2024, <https://www.hrw.org/news/2024/08/14/india-hate-speech-fueled-modis-election-campaign>)。
- 26 鲁迪·朱利安尼在 2020 年 11 月 1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完整记录参见 <https://www.rev.com/transcripts/rudy-giuliani-trump-campaign-press-conference-transcript-november-19-election-fraud-claims>。
- 27 泰德·布雷德和乔治·E·马库斯, 《情绪与政治心理学》(Ted Brader and George E. Marcus, “Emotion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Leonie Huddy, David O. Sears, and Jack S. Levy,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65–204)。
- 28 费尔南多·利蒙吉等, 《政府与国会》(Fernando Limongi et al., “Government and Congress,” *Ibero-Online* 14, 2022)。
- 29 达龙·阿西莫格鲁等, 《民主确实促进增长》(Daron Acemoglu et al.,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 no. 1, 2019: 47–100); 达尼·罗德里克, 《民粹主义与全球化的经济学》(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1, nos. 1–2, 2018: 12–33); 奥拉因卡·奥耶科拉, 《生活可能不公平, 但民主会让它少一些负担吗?》(Oláyínká Oyèkọ́lá, “Life May Be Unfair, but Do Democracies Make It Any Less Burdensom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2, no. 3, 2023: 577–602)。
- 30 劳拉·甘博亚, 《反对派如何反击》(Laura Gamboa, “How Oppositions Fight Back,” *Journal of Democracy* 34, July 2023: 90–104)。
- 31 马克·图什内特, 《宪法硬球》(Mark Tushnet, “Constitutional Hardball,”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37, no. 2, 2004: 523–554); 格雷琴·赫尔姆克、玛丽·克罗格和杰克·佩恩,《通过威慑实现民主:规范、宪法与选举倾斜》(Gretchen Helmke, Mary Kroeger, and Jack Paine, “Democracy by Deterrence: Norms, Constitutions, and Electoral Til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6, no. 2, 2022: 434–50)。

32 土耳其科学学院协会,《学术自由报告,2022–2024》(The Science Academy Society of Turkey, Academic Freedom Report, 2022–2024, Istanbul: The Science Academy Society of Turkey, 2024, <https://en.bilimakademisi.org/wp-content/uploads/2025/03/academic-freedoms-report-2023-2024.pdf>)。

33 对相关事件的描述参见英国律师协会,《正义面临风险:伊斯坦布尔律师协会领导层被解职引发担忧》(The Law Society, “Justice at Risk: Dismissal of Istanbul’s Bar Leadership Sparks Concern,” press release, 27 March 2025, <https://www.lawsociety.org.uk/contact-or-visi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dismissal-of-istanbuls-bar-leadership-sparks-concern>)。

